

Foreign-oriente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struction Model and Social Change

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
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

尤泽顺 著



科学出版社

Foreign-oriente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struction Model and Social Change

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
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

尤泽顺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 / 尤泽顺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3-029751-8

I. ①中… II. ①尤… III. ①对外政策—新闻语言—研究—中国 IV. ①D820 ②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466 号

责任编辑:郝建华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联系电话:010-6403 3862 电子邮箱:haojianhua@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A5(890×1240)

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 1/4

印数:1—2 000 字数:338 000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YY003)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80440108)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子项目
(2009JJD740006)研究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陈德仁学术出版基金
福建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序 一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目前仍然沿袭两种主要的学术研究传统，一种是将语言作为个体的心理现象来加以研究，另一种是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不少学者采用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来区分语言学研究的这两种主要传统。譬如，Leech (1983)¹对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形式主义者(如乔姆斯基 Chomsky)倾向于将语言首先看成是一种独立个体的心理现象，因此，形式主义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的先天普遍性以及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中心地位，其研究强调句法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个人语感在理论解释中的重要作用；功能主义者(如韩礼德 Halliday)则倾向于将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思维的社会性质，关注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功能语言学研究强调的是语言交际系统的相互联系而不是语言形式的独立性，把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发展与变化上，主张形式与功能的选择与结合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应在语言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

韩礼德在明确语言与社会具有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具有社会功能，语言功能存在于语言系统本身，具体的语言使用就是人们在语言与文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选择。韩礼德的语言观使人们对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然而，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分析和揭示词汇和句子使用的社会功能上，又使得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语境，蜕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形式分析。

明确把语言与社会现实及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是后来被称为“批评性话语分析”(CDA)的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关注话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描写和分析人们所处的语言现实，揭示话语如何反

1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Group.

映和参与建构社会现实²。这方面的研究者认为，通过话语分析，人们可以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及话语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通过参与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还可以参与建构社会现实，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对于关心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者来说，CDA无疑是一种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非常有吸引力的视角。

当代世界日新月异，语言与社会变化之间发生更为激烈的互动，为CDA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关系的话语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在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与话语构建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尤泽顺博士所著的《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出版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该研究涉及的内容都是中国现今社会新出现、并与国家发展及对外关系紧密相关的议题，如“中国对外政策构建”、“中国和平崛起”、“海外春节热”、“中国—东盟关系”、“孔子学院的身份建构”等。这些研究表明作者心怀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也表明语言学不能把揭示语言系统或语言使用规律作为唯一研究目标，它应该把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也列入其研究议题。

CDA是一种源于西方并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实践方面都带有明显西方特色的研究视角，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如没有形成完整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缺乏系统的分析工具、分析往往局限于文本片断的主观性分析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借鉴该视角的基本研究思路时，对研究框架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评估，并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进行吸收和创新，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使自己的分析更符合中国实际、更具说服力，如在探讨介入系统如何用于构建国家间关系时，作者讨论了CDA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点、CDA与介入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人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的共通点，从而构建起一个通过分析介入系统的使用来考察国家间友好互信关系构建的研究模式，并结合中西方的历史话语实现对介入系统使用原因及其与社会现

2 van Noppen, Jean-Pierre. 2004. CDA: A discipline come of ag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8/1: 107-126.

实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进行深度探索。同时，该研究把“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作为专题，对专题包含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学者在话语研究，特别是 CDA 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如重介绍和引进、轻创新研究、多理论评介、缺系统性及针对性探索等，为运用 CDA 研究中国具体社会问题提供了示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理论做出了贡献。

此外，该研究在国内首次把语言学视角的微观话语分析引入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为从语言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长期以来，由“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构成的理性传统一直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地位，它们从“国家利益是给定的”这一假设出发，否认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作用，将语言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之外。后现代国际关系和建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建构的结果，而语言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但是，它们对语言建构作用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元理论层面上的讨论，缺乏比较系统的语言分析工具。虽然有些研究把 CDA 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对语言运用进行简单、零碎的描述，缺乏系统性，未能从深层次上揭示话语与现实中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之间如何形成互动。本研究从微观语言分析的角度出发，把语言学和政治学两个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应用于探索中国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模式、话语与社会的互动、话语对外政策实施的影响等，如对《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政策部分的微观分析研究表明，对外政策话语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反映了社会现实，同时还塑造了社会现实，促进了对外政策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关系研究缺乏微观语言分析的不足，为从语言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提供新的思路，为中国的对外政治话语构建和对外政治话语策略运用提供了借鉴。

尤泽顺博士的这项研究成果，是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以开展的博士后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该中心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话语建构》（批准号：2009JJD740006）的主要组成部分。该课题的设计旨在跟踪研究前沿，立

足中国实际，开拓研究领域，力求理论创新；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在社会政治话语研究方面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前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系列研究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就留给读者去进一步讨论并帮助发现了。

陈建平

2010年11月29日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序 二

历史车轮驶入 21 世纪第 10 个年头，人们对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不再有陌生之感，而且愈加深刻地感受到其重要性、必要性、启发性和艰难性。

我院尤泽顺博士继推出《乔姆斯基：语言、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专著后，今又奉献给读者《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研究》。他嘱我作序，我作为他先前的老师之一、如今的同事，当然义不容辞。

这一新成果是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从课题名称本身就可窥见一斑，它主要涉及政治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还涉及跨文化交际问题。要完成这样一个课题，研究者不但需要具备创新思维，而且还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的知识。这些素质在尤泽顺博士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面对“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喜人局面，我对作者的研究历程不无感慨，感慨其科研历程的历史延续性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从本科的英语语言教育学习、硕士阶段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博士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直到博士后期间的对外政治话语分析，他的学习和研究兴趣不断地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但在每一“新领域”研究中又能承袭前阶段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和体会，并找到新的切入点，开拓新成果。他硕士论文关于“强、弱语境”的研究结合了本科掌握的汉英语言文化差异和中外教育差异等知识进行探究，博士论文关于“乔姆斯基语言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以乔氏的语言思想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在宏观上对乔氏的语言观和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批判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和评价，他博士后研究课题“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研究”则是从语言视角出发，结合此前掌握的政治学、跨文化交际、社会语用等相关知识，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考查，力图揭示话语的建构模式，并为现实中对外政策实施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有意的借鉴。这些“转向”

一方面说明他具有开拓创新思维，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他对不同领域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的掌握，并能在新课题研究中予以综合应用，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从而提出个人新观点。

关于本书的创新点和价值，我想应该主要由读者来评价。在此，我主要谈谈阅读书稿后的一点体会。

首先，本书对其研究视角 CDA 本身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目前，CDA 研究在国内外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许多领域都已尝试运用 CDA 研究具体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的兴趣点主要是“CDA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或“应该如何使用”等，对 CDA 自身存在的混乱和矛盾之处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指出了 CDA 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并提出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进行规避。如对于“critical”这个概念，该研究指出，CDA 在理论建构和不少实践分析中赋予该词的含义并不相同：在理论上，“critical”本来只被赋予“reveal”和“evaluate (negatively or positively)”等中性含义，但由于 CDA 提出要通过话语分析“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等激进观点，从而导致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往往以激烈的负面批评代替本应坚持的“正确揭示”和“公正评价”，最终使“critical”在实践研究中滑入“criticize (negatively)”的泥沼里，失去了原有的公允和理性。为此，该研究指出，在实践研究中应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批判立场，保证“critical”在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中含义的一致性。

其次，本书对如何运用 CDA 进行具体研究提供了成功的示范。从本质上看，CDA 研究是一种应用研究。许多 CDA 著名研究学者都曾指出，该研究视角应以问题为导向，其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是选择性的，即应先确定研究问题，然后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相应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视角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然而，这一指导原则在目前的许多 CDA 研究中往往被忽视，相当多的具体研究出现了生搬硬套 CDA 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等问题。相对说来，本研究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比较到位，如对《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就根据“揭示报告与社会现实互动关系”这一目的选择了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互动视角，又根据报告本身具有相对固定的话题、图式和词汇等体裁特点选取了话题分析、图式分析和词汇分析等分析方法；对“海外春节热”

相关报道的研究，重点考查了中国报道如何对海外“春节”各项庆祝活动中所呈现的“和谐”和“祥和”等理念进行构建，其分析既有词频和代词使用等语言符号分析，又有与“春节”庆祝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活动等非语言符号分析。这种灵活选用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做法是本书中各个子项目研究得以完成的保证。

再次，本研究对各具体研究如何贯彻执行 CDA 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做出了回答。CDA 所研究的社会问题往往比较复杂，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各种研究方法，还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and 研究成果对其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和论证，从而达到从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到描述和阐释研究相结合等。迄今为止，大多数 CDA 研究在使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做得非常不错，但也有不少研究者由于本身知识的局限性，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解释时不够深入，有些宣称以 CDA 为视角的研究最后仍停留于纯语言学分析，这与 CDA 提倡的“以语言分析为手段，全面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及文本与社会的互动”这一研究理念距离甚远。该研究在选择研究方法和解释分析结果时对此显然具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其分析方法不拘一格，既有语言分析，又有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等，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对分析结果也根据需要借鉴了语言学、文化学、跨文化语篇对比、政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相关领域的理论成果进行解释，从而达到对话语背后潜藏的各种因素的多维透视。

最后，我想重复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作者的新成果固然与其个人努力分不开，但我想更应归功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术氛围与科研条件，尤其是作者的导师陈建平教授的悉心指导。一部专著是对某一课题的专门研究，其研究成果的独到之处总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迪，但任何一项研究成果又不可能是终结性的“绝对真理”，而是由此及彼，逐层推进，打开更广阔天地的新起点。我相信，作者的一贯禀性与气质、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定能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高，飞得更远。

林大津

2010年11月20日

于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前 言

本研究主要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要演讲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他官方报纸的相关评论和其他官方文本等构成的“当代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批判性话语分析为主要研究视角,以语语分析、政治学和跨文化语用研究多学科相互交融的方式,从语言层面揭示当代中国如何建构其对外政治话语、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如何形成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跨文化互动语境中推动或影响政策的实施。

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其他分析为补充的方法。通过具体话语的分析,将源于西方的理论观点和模式实际运用于我国独特语境和中外政治话语互动语境内,考核和验证它们对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实践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它们的适用范围及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分析和交流理论奠定基础。

研究由几个子项目构成,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却又彼此独立。不过,整个项目始终坚持以下重要观点:①批判性话语分析本质上是一种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研究构架,其选择的研究方式必须与研究问题和研究中涉及的资料相适应(Wodak, 2002: 14),本研究各个子项目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重叠之处,在另一些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些选择主要取决于涉及的具体资料和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②针对目前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通常把研究视角(approach)与分析方法(analytical strategy)混为一谈的做法,本研究坚持认为每个研究视角可能会侧重于使用某种分析方法,但研究视角不等同于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来说,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所有的研究视角,某项研究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视角,但不同视角可以选用相同的分析方法;③研究将尽量修正目前批判性话语分析实践对critical一词的使用,突出其原有的“揭示本质”(reveal)和“评价”(evaluate)的内在功能,淡化其字面上“批评”(criticize)的作用,同时,尽管本研究主要分析书面资料,但对discourse

一词的使用将尽量宽泛,使其不仅指口头语料、书面语料,而且还包括图像及其他各种非语言因素;④政治话语分析是源于西方、以西方社会文化现实为基础的研究,本研究在将其嫁接到中国语境时将始终避免生搬硬套,力求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注意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纳入具体的话语分析工作中。

本研究由理论介绍和实际分析两部分构成,理论主要集中在第一章,实际分析包括第二至第七章,分析的对象由很严肃的正式官方文件依次过渡到半正式的官方文本,具体顺序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政策部分、郑必坚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他官方报纸对“海外春节热”的评论、教育部及大学官方网站对“孔子学院”的介绍等。

第一章介绍了西方政治话语研究的历史,CDA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存在的不足,本研究采用或涉及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分析步骤等,为下一步开展具体分析作理论铺垫,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①指出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②各个分析视角既有长处又有缺陷,必须根据具体研究目的相互补充,其中费尔克拉夫(N. Fairclough)提出的“话语与社会互为建构”应作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基本出发点,范戴克(T. van Dijk)提出的“认知是话语与社会互构得以运作的中介”是话语分析之所以可以通过具体语言运用的分析来揭示权力关系的依据,沃达克(R. Wodak)提出的“将历史话语纳入当下话语的分析”表明只有追溯话语和权力关系形成的历史根源才能真正揭示出当下话语中潜藏的权力关系。

第二章将费尔克拉夫的福柯后结构分析视角与范戴克的社会认知分析视角相结合,通过话题分析、图式分析和词汇分析三个层面对1993-2007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政策部分进行历时分析,表明话题选择、图式编排和词汇变化等构成的“话语秩序”(或者说“理念”, ideology)如何被自然地应用于构筑中国对外政策,表达政府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和影响对外政策的实施以及“话语秩序”与新的话语如何共同反映社会现实并对社会现实产生塑造作用。

第三章将福柯后结构分析视角、社会认知视角和沃达克的话语历史

分析视角相结合,对郑必坚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7篇政治演讲稿进行命题分析,揭示“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基本图像、来自中西方的历史话语在理念建构中的作用、该理念对人的认知方式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塑造作用。

第四章在融合费尔克拉夫话语—社会互动、范戴克的社会认知和沃达克话语历史分析视角的基础上,将功能语言学人际意义评价策略引入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揭示郑必坚如何运用评价理论中的“介入”(engagement)策略在“中国和平崛起”演讲中构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和崛起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通过运用介入策略,他使西方语境中“崛起”的过程和结果所隐含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得以消除,使“崛起”与“和平”这一矛盾对立体最终得到统一,使“中国和平崛起”不仅可能,而且对世界是一种“机遇”,不是“挑战”和“威胁”。

第五章将福柯后结构分析视角、社会认知视角和话语历史分析视角相结合,对《人民日报》海外版涉及“中国—东盟关系”的报道进行分析,阐明中国新闻工作者通过为东盟构建各种不同的身份来表明双边关系正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强化等;其身份构建方式不仅借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话语,而且还与双方的地缘关系及中国的文化历史话语相联系;这些话语已对人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并对社会现实产生塑造作用。

第六章将福柯后结构分析视角、社会认知视角和话语历史分析视角相结合,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他官方报纸与“海外春节热”相关的评论进行分析,阐明中国评论员如何通过词汇选择、代词使用、文化符号刻画和社会活动描述等竭力塑造出海外春节庆祝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跨文化和谐气氛。文章对“和谐”气氛的塑造不仅源于春节本身的文化内涵,还源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和谐”这种历史话语的强调。

第七章在融合费尔克拉夫话语—社会互动、范戴克的社会认知和沃达克话语历史分析视角的基础上,运用费尔克拉夫等对公共话语(特别是高等教育话语)市场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与“孔子学院”相关的宣传话语进行分析,阐明目前作为保护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和汉语语言、扩大两者世界影响、促进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最主要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其话语如何被市场化话语所侵蚀以及该现象将产生什么后果。

本研究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当代中国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模式和社会变迁进行专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批判性话语分析对欧洲问题研究多、对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研究少，对国内层面话语研究多、对国际层面话语研究少，零散研究多、专题研究少等方面的不足；②将费尔克拉夫话语—社会互构分析、范戴克社会认知分析、沃达克话语历史分析等结合起来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具体项目需要适时引入其他分析视角作为补充，把语言学、政治学和跨文化语用等领域的相关知识用于具体对外政治话语分析和讨论，既揭示了话语的建构模式和变迁，又阐明话语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社会认知心理、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等因素，打破了语言学、政治学和跨文化语篇对比等学科各自为战的局面，使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不仅延续其跨学科性特点，而且成为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③通过对中国特定语境和中外话语互动语境中具体语料的分析证明批判性话语分析适用于中国话语分析研究，前提是必须根据具体研究目的和语料进行必要的改造，特别是必须将中国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融入具体的分析中，消除以西方历史文化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理论在解释中国话语事件时所具有的局限性；④对政治话语批判性分析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对中国具体话语事件的分析研究表明，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和中外政治话语互动研究以及在从事与话语相关的理论引进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既不能一概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以顶礼膜拜，也不要一概给予排斥，应该通过对引进理论的实际应用，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和“地域性”，实现理论超越与创新。

本书内容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建构模式与跨文化语用研究”（08CYY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中国当代对外政治话语：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20080440108）、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盟关系的话语建构”（2006B2029）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

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话语建构”(2009JJD740006)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书中第二至七章的实践研究部分大多已在国际知名期刊或国内期刊上发表过,在成书的过程中进行了适度修改。

本书能够最终出版与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两年多的学习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在此,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陈建平教授。在站期间,陈老师不仅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潜心学习和研究,而且在学术研究问题上和我进行耐心、细致的讨论,帮助我理清课题思路和研究视角,使我最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and 博士后基金项目。可以说,离开陈老师的帮助,本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目前的成果。

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初明教授和副主任冉永平教授,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始终给予极大的支持,特别是在申报课题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感谢冯光武博士、桂诗春教授、何家宁博士、何晓炜教授、霍永寿教授、刘建达教授、钱冠连教授、沈三山博士、温宾利教授、吴旭东教授、徐海教授、郑超教授等,他们开设的课程和讲座对我的研究帮助甚大,同时,他们还在治学和教书育人方面为我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期间的同事和同学谢朝群博士、姜琳博士、李美华博士、王加林博士、杨竹博士、钟红博士、刘齐生博士、张革承博士、李亮博士、赵晨博士、李光泽博士等,与他们的讨论和交流不仅使我开阔了研究视野,而且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事处方迎生处长、谢文新处长、师资科孙远雷科长、姜会东老师、吴志军老师,感谢科研处项目科的孙波科长、陈平老师和综合科的潘相宇科长,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张新荣老师和肖沅陵老师,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种种便利和支持。

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跨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事林大津教授、陈维振教授、李荣宝教授、刘亚猛教授、王丽丽教授、黄远振教授、薛常明博士等。作为学院领导和我的老师,林大津教授一直鼓励我不断学习和研究,为我的项目研究提出各种参考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为我创造种种便利条件。主管科研的李荣宝教授始终关注本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福建师范大学陈德仁学术出版基金和跨文化研究中心共同

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

感谢科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社长郝建华编审，她对学术质量的重视、高涨的工作热情和超乎想象的工作效率使本书能够按计划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父母、岳父母和我的弟弟妹妹。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期间，妻子不得不承担工作和照顾孩子的双重任务，父母和岳父母也经常帮忙照顾我的家庭和孩子，弟弟妹妹在我困难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儿子在我疏于照顾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幼儿园生活。此书的出版正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尤泽顺

2010年10月于福州